

Benjamin A. Elman :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irst published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0 , xv+847pp.

《关于晚期中华帝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 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张国刚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本书是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科举制度的一部新文化史，叙述了科举制度从创立到终止的历程，认为 1370-1904 年间的明清科举考试（文官考试，Civil Examinations）与 650-1250 年间的唐宋科举考试（文士考试，Literary Examinations）之间有实质性断裂。（比如后者主要考经学，前者则考理学。）书中指出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考试所包括的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实际运作，它也确定了理学在官员生活和士人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包弼德教授评价说，该书“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科举制度）的力作”。（见该书封四）

本书作者艾尔曼，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教授，著有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文版 1997),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i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1990, 中文版 1998 年)，合编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1994)。曾经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最近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接替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的职位。

全书共分十一章，兹各章基本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章对于 1240-1425 年间理学（书中使用“道学”一语）如何在朝廷扶持下逐步发展，以及理学如何在明代成为几百万考生的课程进行新的探索。该章基本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讨论汉唐时代的选举制度，以及唐代以后到明代历朝科举制度的发展。重点讨论宋明理学如何成为科举制度的基本教程。

第二章的标题是《帝国的权力、文化政策与明代前期的科举考试》，这里所谓明朝前期指洪武、永乐时期，该章揭示，理学在元、明、清三代的胜利并非其在南宋时期的发展所决定，南宋的理学家们只代表一种知识传播运动，对科举考试的影响是偶然随机的。以理学为正统达成思想一致是明代的建树，理学随而在明代科举考试中占据正统地位，明代的皇帝们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在此过程中是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第三章《科举考试的制度动力与精英动员》、第四章《科考结构与朝廷权力的范围》、第五章《经典文献与晚期帝国科举考试的容量》基本上不仅考察了科举制度内涵，而且试图分析发掘明清科举制度更为本质的东西。作者认为晚近关于明清两朝的研究对晚期帝国科举和武举的规模及重要性估价偏低，作者将 5 个世纪里持续实行的科举考场，决不单单是一个考试场所，而是个人认同社会和国家，以及朝廷为了以政治手段动员全部民力而进行的一个综合性体，并且开展了综合性分析。第三章研究包括听选考试和升迁考试的地方文官考试，体现考试的社会组织职能——州县官员花大量时间在辖区内主持两年一次的文官考课和升迁考试，也要负责辖区内军官的考课、听选和升迁考试，而他们又是布政使司三年一次的考核

对象。以往关于明清州县官员的描述都集中在税收和狱讼职能，并以此暗示官员为取得功名所接受的正统教育与当官后的实际职务所需的知识没什么关系，这也是该章力图纠正的观点。由于科举影响，语言表达能力与文言写作能力成为晚期帝国社会确定文化程度高低的关键标准。第五章指出，明清的科举制并非出于增进社会流动性而设立的制度，相反，它是将吸收和排斥制度化的体系，由此将不公正的官员选拔公开合法化。

第六章《情感焦虑、成功梦想与科考生涯》，该章比较从几份明清时代的备忘录中搜集来的士人作品、小说和故事中的通俗描写、以及民间传说，它们与个人历练和被试人与主考人之磨难结合相伴随，由此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为什么科举考试是 1400 年以后中国文化史上的核心事件。在过去的研究中，科举和武举的文化意义通常是被作为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精英社会与士人文化的一个方面来讨论。本书则以许多更加晚近的作品为基础，指出考试代表着超出土绅社会的社会边界的一种象征性秩序，而这一秩序在大众文化中扮演显著角色并反过来被民间宗教心理所影响。

第七章《科举考试的文化范围与精英中的八股文》、第九章《自然研究、史学与汉学》以及第十章《1800 年以前清朝考试科目的改革》，侧重审视科举考试的文化和知识范围。以往的研究偏重描述八股文的主导地位，沿袭顾炎武关于考官阅卷不重策论的观点。但本书认为，明代考官阅卷比清代考官仔细得多，而且在乡试、会试中要详细说明从义、论、策三试中挑选最佳答卷的理由。八、九章主要是通过重构课程的变动不居来订正那些关于科举考试的片面的文学描述，尤其是揭示出二场论试和三场策试的重要性。策试的考试地位虽然 15 世纪晚期已被八股文压制，但它仍然是重要学术标志而受士人重视，第八章证明，考据学正是在 15 世纪晚期作为策试的一类而兴起。第九章证明，有关自然界和不寻常现象的策试在明代十分普遍，但在清代几乎绝迹。以此新发现为基础，重新评价“自然研究”在国家考试中的角色，而以前认为耶稣会士在康熙朝廷的立足应使有关自然界的问题更多，这其实是空想。第九章也揭示出史策从风格到内容的转变，明代倡导理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清代则偏爱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传统。

第十一章《合法化与经典化的剥离：晚清科举改革的潜在危险》讲述当清朝 1904 年以“西化”名义宣布废除科举和武举考试时，清朝丧失了产生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的一个关键工具，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亦被解除。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替代教育手段，废除科举考试加速了满清政权的衰亡和最终被倡议共和制的汉族城市士绅精英所取代。但是直到现代学校和教育形式如科举制以往那样渗透中国社会，直到新式学校被广泛理解和被几百万秀才视为“自然的”而接受，围绕科举制建立起来的文化系统才真正受到重击。

本书是一部采取多维度分析的力作，作者运用 1000 多条新获的考试记录来揭示科举考试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维度，强调 1400-1900 年间政治、经济、精英的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宗教、占卜术的交叉，反映出考试过程涉及的整个范围，这种交叉使几百万人参与这一过程并影响到晚期帝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维度的联系主要通过细致讨论科举考试在文化、政治、知识、社会和官僚领域的不同功能来展现，同时表现帝国制度在每一角逐场所扮演角色的限度（边界，limits）。伴随科举考试的是一个覆盖全国的教育体系，该体系有众多功能，并将京师、行省和地方的各种利益联合起来。科举考试及相应的教育体系在晚清中华帝国有其历史价值，因此也具有长期的历史合法性，因此当被现代派改革者唐突取缔之后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后果。

本书主题是，地方精英与朝廷都不断影响政府重新审视和调整正统课程，并吸纳新的方法以改进选拔文官候选人的制度体系。各章显示，科举考试作为对教育之优越性的测试，如何成为将王朝和士人文化硬性联为一体的手段。科举考试成为反映宽泛的士人文化的一扇窗户，因为这些考试早就通过帝国利益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合作关系而被那种文化渗透，这种合作关系共同打造了正统教育课程。科举考试是各种政治和社会利益彼此竞争制衡的一个文化

角斗场。晚期帝国政府力图通过科举考试控制士人文化，而政府内外的士人群体总想避免被控制，并经常靠着以考试影响政府政策或唤回士人价值而成功地扭转局面。此外，地方精英即使永不入仕，也还是坚定不移地利用地方各级考试来提高他们及家族在当地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3-10-31

作者简介：张国刚，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